

龟兹石窟中动物画的源流探析

TEXT / 姚志虎

在古代龟兹,为了宣扬佛教,艺术家绘制了大量的壁画。除了那些表现佛、菩萨、护法像、僧尼、供养人等题材外,还有大量精美绝伦的动物画。这些成千上万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动物形象,表现得异常精彩。深入探讨龟兹石窟动物画的源流,对进一步研究龟兹壁画艺术特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龟兹石窟动物画的源流展开论述。

一、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的联系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它的源头在印度。佛教不仅有阐述教义的经论典籍,而且还借助艺术的方式,进行形象化的弘扬。佛教艺术的兴起,正值印度与希腊、波斯文化交流的孔雀王朝时代。桑奇大塔和巴鲁特塔是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其塔门的横梁,侧柱雕刻了大量的动物,诸如大象、狮子、公牛等;壁画中绘有大量的本生故事,其题材也都采用动物形象,如“六牙象王本生”、“猴王本生”、“熊王本生”等,随后的阿马拉瓦蒂文化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大量的动物形象出现在雕刻和壁画艺术中。

源于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传入龟兹,至3世纪中叶,已在龟兹得到广泛的传布,4世纪后进一步兴盛起来。佛教的兴盛,必然促进佛教艺术的发展。随着佛教的东传,印度高僧接踵来到龟兹弘扬佛法,异地画师携带各种佛画粉本和画稿纷沓而至,有的在在此小作逗留后东去中原,有地直接投身于龟兹石窟壁画创作,从而将键陀罗、笈多艺术的信息带入龟兹。公元4—6世纪的笈多文化时期,中印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印度僧人到龟兹石窟寺庙传教,龟兹的佛徒到印度求经拜佛,甚至中原的法显、玄奘大师也去了印度求法。这种互通往来的佛教文化交流不在少数。在龟兹的早期石窟中,主室券顶所绘的几乎全是本生故事。如龟兹的克孜尔石窟中目前保存得最为完整的17号窟的窟顶中就绘有大量的佛本生故事。大量的动物,如马、象、鸽、猴、鱼等出现在这些佛本生故事画中。这也是延续了键陀罗佛教艺术的特点。在龟兹石窟中,除了大部分石窟由龟兹人开凿的以外,还有一些石窟明显地是由印度人、伊朗人、吐火罗人、吐蕃人以及中原的汉人开凿的,因此,在龟兹石窟艺术中可以看到各种文化,即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中亚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其中必然包括从印度及中亚传入龟兹地区动物画的粉本,以及途径龟兹地区工匠们的制作经验。

二、龟兹本地文化艺术的传承

在东西方文明的传播过程中,龟兹地区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进

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研究此纽带地区的文明,而径直研究处于两端的的东西,那是不能得其正鹄的。”

古代西域具有高度的文化,在文学、艺术上为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西域多姿多彩的原始艺术中,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原始艺术——岩画,也在悄然产生。早在公元前就有对岩画的记载。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特别记载了新疆等地的岩画,“河水又经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画,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天山以南温宿县的包衣东、图木休克山区,在天山以北的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山区岩画中,都有栩栩如生、各种动物岩画。库鲁克山著名的兴地岩画中,刻画了几十种大小不等的动物形象。其中,有一组动物图,共描绘了虎、羊、鹿、马、牛、狗、雁、鹰及骆驼,它们或卧或立,身姿各异。在这些岩画中,动物成为了岩画的主角。秦汉时期的西域,由于民族的迁徙和征战,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具有草原马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如同他们的游牧生活离不开动物一样,动物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题。他们的生活用具、食具、兵器上雕刻着狮子、老虎、雪豹、猛禽等动物纹饰,甚至在马鞍、马肚带有大量包金的木雕兽形饰牌等这些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动物形象,镌刻着西域先民生活图景和意识观念,体现了西域本土艺术的传统特色,可见刻画动物成为龟兹先民的艺术爱好。龟兹石窟中无数动物画正是来之于龟兹地区的大自然,来之于龟兹人民固有的艺术传统,更来之于龟兹画家从远古艺术品中所汲取的营养。若对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动物画追本溯源,可以看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自佛教艺术经中亚传入龟兹,龟兹就以其深厚的传统地域文化改造着外来文化,从而锻造出适合于自己的文化风貌,也使得龟兹石窟中的动物画呈现出独具西域特色的艺术作品。

三、现实生活之根源

龟兹石窟艺术虽然是一种宗教艺术,但是,她并不是游离于人民生活之外的东西。不论艺术的想象力还是宗教的想象力飞得再高,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生活。马克思在致阿·卢格的信中曾指出:“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据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

龟兹石窟壁画中所描绘的动物种类繁多,有孔雀、鸚鵡、兰鹊、虎、熊、羊、猴、鹿、蛇等不下数十种。即便是一种动物,品种也在几种到十几种不等。这些动物多出现在本生故事画

中,以阐释佛教教义,但动物的形象则是来自现实生活。在克孜尔224号窟的券顶菱格内就绘有虎、狮、熊、羊、鹿、猴、狗、鸭、鸽等18种动物。这些飞禽走兽,或疾驰缓行、或飞鸣栖止,千姿百态,无不形神具备。其中有一副母鹿哺乳幼鹿依依不舍的画面。母鹿曲颈低头,舔舐幼子,子鹿依偎在母鹿身下,伸直了脖颈吮吸着母乳。母鹿姿态所形成的圆弧形的动态线更加强了相互依恋的母子情意。尽管这幅动物画是依据佛教故事而创作的,但就动物画本身来说,我们不由得惊叹于古代龟兹画家把握动物瞬间典型动态的能力。龟兹石窟壁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山林鸟兽图,它们都是自然景物的真实描绘,完全脱离了宗教色彩。如克孜尔77号窟券顶的壁画中,在一枝花树旁,一只鹿低头饮水,另一只则回头返顾,凝听动静。库木吐拉2号窟后甬道顶部绘有一只野猪,画家通过简练而富于变化的线条将野猪动态表现的惟妙惟肖;竖起的长鬃,瞪大的眼睛,微微抬起的前腿,这些细节的描写,正体现出野猪受到惊吓正要逃窜的瞬间表情。又如克孜尔224号窟,一只大角鹿伫立在山林中正机警地观察这周围的一切;一只母鹿低着头正在泉中饮水;一对山鸟腹背相依正在戏耍等等。这些动物形象十分逼真,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其艺术形式已突破了佛教内容的束缚,也体现出龟兹画家“以形写神”的高超技艺。龟兹各族人民曾长期从事放牧、狩猎活动,各种动物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真挚热爱和切身体会,要想把这些动物形象描绘出来,而且勾画的如此鲜活生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研究龟兹石窟中动物画产生的源流时,我们既不能忽视印度、中亚佛教艺术等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更不能夸大其影响,从而导致本土因素的缺失,乃至削弱龟兹本土艺术的历史地位。龟兹石窟中的动物画是以现实生活、自身历史积淀为基础,以龟兹本地文化传统为主流,兼收并蓄西方外来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一种独特地域风格的动物画。同时,龟兹石窟中的动物画艺术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其一,龟兹石窟动物画艺术始于宗教而终于审美,人性高于神性;其二,形象大于义理,形式大于内容;其三,文化的创造不是个别人的成果,而是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

[本篇文章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疆项目)《龟兹石窟中的动物画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0xjjc760004]

【姚志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